

# 美國霸權變遷 與兩岸關係發展

蔡東杰\*

## 摘 要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國際政治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階層性」傾向，其中又以「霸權」現象最受到矚目。儘管如此，隨著時代環境的演變，所謂霸權定義及其行為特徵也會跟著出現不同。在本文中，我們試圖透過歷史觀察，將過去曾經存在過的霸權型態歸納成「古典型」、「歐洲型」與「現代型」等三種類別，甚至預測可能發生的「未來型」霸權；一方面瞭解這些不同霸權型態到底對過去與現在的世界有著何種影響，同時也以兩岸關係為例，希望能藉此瞭解後者的未來可能發展。

關鍵詞：霸權、霸權穩定論、工業革命、美國、中國、台灣

## 壹、歐洲型霸權與現代世界秩序

在國際政治史上，所謂「強權」(great power)或者是「霸權」(hegemony)國家的存在，儘管是相當普遍且自然的，但這類說法並不僅是種用以說明國家間權力差距的「描述性」名詞而已，更重要的是，它還具有一定的「操作性」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多數的強權與霸權國家都經常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積極的介入或調停角色，甚至還主動建立體系規範，並對破壞秩序者給予某種程度的制裁或設法控制其行爲。

(Kindleberger, 1981: 242-259; Keohane, 1980: 131-162)<sup>1</sup>正如羅馬史家 Cornelius Tacitus (55-117)所言：「它們製造了殺戮，卻又將其稱之爲和平。」可說是典型的霸權行爲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當中，暫且不論其興衰原因爲何，(Gilpin, 1981; Kennedy, 1987; Oye & Rothchild, 1987: 3-40) 根據所謂「霸權」國家出現的先後，它們的外貌其實存在著相當不同的形式，我們姑且將其分別稱爲「古典型霸權」(Classic-style)與「歐洲型霸權」(European-style)，其時間分野約略是在西元十五至十六世紀之交，亦即一般所稱「地理大發現」時代前後。主要差異在於，早期「古典型霸權」的出現

<sup>1</sup> 部分霸權穩定論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學者似乎較重視霸權對國際「經濟」秩序而非「政治」秩序的維持。

固然也可能與某種莫名的擴張慾望或衝動有關，但這類心理因素往往只存在少數領導階層心中，它們的擴張原因其實更大部分地涉及到狹義的國家安全問題，亦即希望透過不斷的征伐或介入來徹底殲滅或驅逐可能的邊境威脅；<sup>2</sup>其後，憑藉著軍事優勢（或者再加上文化優勢），它們自然也成為區域體系規範的締造與捍衛者（例如由中國所建立的朝貢體系等），從而鞏固其霸權地位。

相對地，所謂「歐洲型霸權」則顯然與萌芽於中古末期的宗教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前者為歐洲擴張的部分層面（例如遍布全球各地的傳教運動）披上人道主義外衣，同時也成為後來所謂「理想主義」（idealism）外交政策的根源，至於後者則赤裸裸地直接訴諸人類無窮盡的物質慾望，從而也成為「現實主義」（realism）外交政策或後來所謂「全球化」（globalization）潮流的源頭之一。<sup>3</sup>（Tehrani, 1999: 17-18）與淵遠流長的「古典型霸權」比較起來，「歐洲型霸權」在某些層面上似乎超越了狹義國家安全的目標，非但有許多民間企業家也積極投入擴張過程，甚至國家（或政府）經常所扮

<sup>2</sup> 例如來自色雷斯、伊里亞與希沙利人的威脅構成馬其頓擴張的原因，為迎戰高盧人與迦太基人，於是開啓了羅馬的擴張時期，而自匈奴、突厥乃至於蒙古的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也一再引發中國往西北邊疆征伐。

<sup>3</sup> 若干學者認為宗教因素在早期帝國建立過程中不僅是擴張因素，也是正當化來源。

演者，有時也僅是個捍衛既得商業利益的消極性公共財角色而已（請參考表一所列）；更重要的是，「歐洲型霸權」在擴張過程中不僅相當重視體系規範（特別指以條約為中心的國際法）的落實，同時在規範制定過程中也更主觀而缺乏包容性與妥協性，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其心理層面上的優越感（Kiernan, 1995）。無論如何，隨著工業革命在十八世紀末的爆發，歐洲於是在擴張「慾望」外，首度獲得了實際的擴張「力量」；其結果是「歐洲經濟突破了它在漫長十六世紀所創造的疆界，開始將巨大的新地帶併入它所包含的有效帶動分工中」（Wallerstein, 1989: 129），從而使全球性的世界體系因此有機會跟著真正地建立起來。

表一：霸權模式分類及其比較

霸權模式	古典型霸權 (before 1498)	歐洲型霸權 (1498-1945)*	現代型霸權 (after 1945)**
代表國家	馬其頓、 羅馬、中國、 蒙古	西班牙、 荷蘭、英國	美國
權力基礎	軍力	軍力、經濟	軍力、 經濟、文化
擴張原因	狹義安全觀、 權力慾	廣義安全觀、 獲利、優越感	獲利、 普世主義
經濟型態	游牧、農業	工業（製造業）	知識產業
正當來源	武力鎮壓、 文明差距	國際法	意識型態認同
政策重點	征服、 階層性威望	殖民、建立國際 規範、制衡	同質化、 爭端解決***
體系特色	帝國架構	國際法 (國家)體系	全球化網路社會
穩定挑戰	政治腐化、 軍備廢弛	軍備競賽、 經濟停滯	軍備擴散、 文明衝突

\*1498年：Columbus 在第三次航行中首度登陸美洲大陸，  
da Gama 也於同年越過好望角。

\*\*1945年：美蘇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即展開  
全球性冷戰對峙。

\*\*\*此處所列乃各種特殊霸權模式所使用的政策重點，並不  
表示其他模式不使用類似政策。

如果以第一個可被稱為「全球性」霸權國家的大英帝國為例，其殖民擴張雖可遠溯至十七與十八世紀時，但由於政治與經濟結構均未完成調整，因此直到十九世紀初才確實奠定了它

在歐洲或全球國際體系中的地位(Speck, 1993: Chap. 3)。<sup>4</sup>值得一提的是，自十九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的國際體系其實是分成兩個世界來運作的：首先，在歐洲國家間所存在的乃是種被稱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平行性互動模式，其中英國只不過是個具較高優勢，並在某些層面（例如國際法的維持與建立海洋規範）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強權」國家而已(Kennedy, 1987: 188)<sup>5</sup>；至於在歐洲國家相對於世界其他區域的階層性互動關係上，則幾個重要的殖民國家在其勢力範圍內，都不啻可說是「霸權」國家，亦即它們都擁有極不對稱的權力優勢，甚至還可以制定規範（例如不平等條約形式）來保障其既得利益，並施加必要的懲罰；當然，英國是其中力量最強大的一個「霸權」。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民主形式在十九世紀中期後出現於歐洲各地，一方面國會雖獲得對政府決策的更大約束或塑造能力，使中上社會階層的聲音得以表達出來，但由於此時期的民主離「全民性」還有一段很遙遠的距離，亦即國會經常被舊貴族階層與新資產階級所把持，於是極少數統治

<sup>4</sup> 這裡是指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所完成之經濟(工業革命)與政治(憲章運動)的雙重革命。

<sup>5</sup> 例如 Kennedy 便強調，由於太過宣揚軍隊的非生產性，因此「在維多利亞女王中期，儘管英國經濟成就輝煌，卻可能是自斯圖亞特王朝以來對戰爭最缺乏動員的時期」。

的結果更讓政府不過只是既得利益的守門者而已（Arrighi & Silver, 1999: Chap. 3）。在這種情況下，現實主義原則乃愈來愈成爲帝國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行爲根源；非但殘酷的經濟剝削逐漸激起落後地區的反殖民革命情緒，（Tomlinson, 1975: 337-380）甚至歐洲國家間在引進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相關想法後，更將彼此間的商業競爭激化到與國家生存同等的地位上。由於沒有爲自己留下任何可轉圜餘地，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爆發兩次大戰也是毫不令人意外的。

## 貳、美國與兩岸分裂變局

正如眾所週知，由於一定的文化聯繫性、到達某種程度的工業發展、相對於其他區域更密切的地理鄰接性、自獨立後逐漸形成的社會特徵，以及未受到兩次大戰波及……等原因，美國乃逐漸在二十世紀初期崛起成爲可與主要歐洲國家並駕齊驅的「強權」國家（Schulzinger, 2002: 19-37），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繼續躍升成爲被稱爲「超強」（superpower）的全球性「霸權」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從某些層面來說，美國可說是所謂「歐洲型霸權」的巔峰型態。特別是相對於上一任霸權國家（即大英帝國），美國的外交政策明顯地有著一定程度的延續性：美國

首先在經濟事務上面延續著「標準設定者」(standard setter)的角色，一方面繼續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捍衛者，強調開放市場的重要性，同時更將英國用以維繫國際金融秩序的「金本位」制度進而強化為所謂「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藉此掌控國際經濟情勢發展(Hudson, 2003: 179-180)；<sup>6</sup>其次美國在戰略上也延續英國的「海權 vs. 陸權」政策，以海權國家的領導者自居（儘管它也算是個陸權國家），然後從地緣政治學與意識型態對抗等角度出發，將可能盤據「世界島」（指歐亞大陸）的「邪惡共產主義國家」蘇聯，視為美國國家安全與世界秩序的最主要挑戰來源（Schulziger, 2002: 207-210）；由某個角度看來，美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對蘇聯的圍堵政策及戰略，其實與英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對俄國政策簡直如出一轍。正因如此，在二次大戰後終於跳出「孤立主義」陰影的美國，於是自 1950 年代起積極展開新的國際戰略佈局。

不過，我們更須注意的是美國在霸權政策的創新部分，亦即其所擁有的「現代型霸權」(Modern-style) 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正當性」(legitimacy) 一般被認為是國際政治

---

<sup>6</sup> 儘管英國試圖透過「國際化」來抑制美國戰後的經濟影響力，結果依舊功敗垂成。



裡頭最低限度的道德層面要求，亦即強國最起碼在政策上要能做到自圓其說，或符合某種普世或自訂的正義原則（例如義戰 just war 觀念），以便維持其「良性霸權」的假象或外貌。例如像英國，由於其現代政治體制的出現乃由於自十七世紀以來包括清教徒革命與光榮革命等運動的結果，換言之，既然英國可經由「革命」（revolution）來進行政體轉型，理論上便不能反對其他國家循同樣途徑發展，這也是它在歐洲 1830 年代與 1848 年革命浪潮中所以置身事外的原因之一。同樣地，基於美國的開國歷史與政治特色，美國一方面無由反對殖民地獨立的發展，甚至還提出「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主張，此外身為全世界第一個採用民主制度的國家，美國也必將全力捍衛相關民主政治運作原則的正當性。<sup>7</sup>於是「政治民主化」乃繼「經濟自由開放」與「建立國際秩序」後，成為美國另一個重要的霸權政策焦點；由此看來，相較於早期崇尚商業性現實主義並直接訴諸國家利益的「歐洲型霸權」，因為加入了些政治意識型態與社會主張，於是讓美國具有更多的道貌岸然外表。

可以這麼說，美國的中國政策不僅受到其霸權地位的直接影響，同時亦正可說是前述延續性與創新性交相激盪下的複雜

<sup>7</sup> 捍衛民主原則不僅與「正當性」問題有關，美國同時亦希望藉此建立其「文化優越性」；但此種作為有時也讓美國被冠上「文化霸權」或「文化帝國主義」的稱號。

結果。從前者來看，爲了繼續英國圍堵最大陸權國家（俄國或蘇聯）的目標，中國乃勢必成爲美國全球戰略中的緩衝區或甚至是制衡工具，由此，儘早結束中國內戰並保持該國的「非共產化」，便成爲其霸權政策運作下的必然走向(May, 1975: 10)；但不管受到孤立主義遺緒或「重歐輕亞」戰略的多大影響，在中國內戰中到處出現的有關民族主義與要求民主化的口號，一方面透過國際傳播與輿論塑造而影響了美國的決策過程，同時在因躊躇而錯失干預時機後，更使其爲撇清責任關係而自縛手腳 (Acheson, 1969: 302)。同樣「虎頭蛇尾」的例證並不僅出現於中國案例裡頭，在整個冷戰時期的全球干預歷程中，類似案例可說是不勝枚舉。儘管如此，由於美國仍擁有一定的干涉「慾望」與「能力」，這也使它經常透過製造分裂或顛覆不友善政權來完成其政策要求。

在中國的例子中正是如此。在情勢未明朗前，「打倒帝國主義」與「要求政治民主」等道德口號不僅削弱了美國企圖介入的正當性，至少也使它沒有理由支持在宣傳中落居下風的南京政府；不過，始終無法與中共建立正式聯繫，以及蘇聯勢力可能藉此進一步擴張赤化版圖的隱憂，最終還是讓美國不可能完全鬆手。<sup>8</sup>爲求政策平衡起見，於是保存台灣便成爲可接受的

<sup>8</sup> 例如在國府遷離南京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卻留駐等候與中共談判

選項之一，至於其正當性則先是來自 1950 年的「台灣地位未定論」，<sup>9</sup>但因此說爭議太大，更重要的是在韓戰爆發後，由於與中共間因陷入直接敵對狀態而明顯無法在短期內修復關係，但台灣問題也不可能被長期擱置，於是美國乃乾脆轉而利用「法統延續」理由來解決問題，亦即與遷台政府直接重建正式外交關係（Purifoy, 1976: 298-306）。自此，兩岸間的長期分裂也成爲定局。

### 參、從圍堵到交往：政策背後的环境變化

從前述發展中，我們當可明顯看出美國霸權政策的目標與限制所在。亦即作爲「全球性」的霸權，美國因此具有介入各區域事務的權力與「義務」，但受限於其自訂的民主或道德標準，美國也不可能像過去「歐洲型霸權」般毫無顧忌地干預他國內政，再加上美國民眾向來重視「人命關天」，亦即絕不輕言犧牲，這也使其外交政策受到相當大的限制(Brzezinski, 1997: 5)。<sup>10</sup>

---

(Chen, 1955: 22) 事實上此時美國內部對於中蘇關係其實有著「附庸」或「獨立」的對立看法，請參考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Washington D.C., 1978)。

<sup>9</sup> 例如 Truman 曾宣告：「台灣未來地位之決定應俟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中日條約簽署後，或交由聯合國討論。」se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ly 3, 1950, p.5.

<sup>10</sup> Brzezinski 特別強調民主制度既限制美國的軍事行爲，也降低其全球恫嚇力，並由此推導民主政治不利於帝國動員的結論。

從更深入的角度來觀察，正如表一所列，前述所謂「古典型霸權」與「歐洲型霸權」的區分並不僅在形式與手段的差異而已，更重要的還是其「權力要素」問題；亦即在「古典型霸權」階段，「軍事」力量仍此時期霸權國家必備的最重要權力要件。當然，古典霸權國家兼具文化影響力者可謂比比皆是，但在此時期中，特別是活躍於亞洲北部草原的遊牧民族，往往單靠優勢武力便可建立起龐大的帝國版圖（薩孟武譯，1986）；<sup>11</sup>至於蒙古帝國則可說是巔峰代表作。不過，相對於早期「古典型霸權」國家的經常曇花一現，後起的「歐洲型霸權」國家非但影響力更廣泛，與其他國家間的權力差距更為懸殊，在持續性上面也明顯地愈發悠久。其緣故在於，無論是早先重商主義式的全球殖民擴張或者後來基於工業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帝國主義國家，除軍事要素外，「歐洲型霸權」都因為加上了「經濟」要素而成為新的「雙重霸權」（dual hegemony）型態。特別是組織與訓練等傳統軍事要素面向固然仍舊重要，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經濟力由於有助於技術創新與軍備競賽，於是乃成為更關鍵的力量（Curtin, 1990; Hobsbawm, 1987）。例如一度雄霸海上的英國由於被新興的德國拉近經濟力差距，於是只好在二十世紀初放棄「光榮孤立」外交政策，改由結盟途徑來保

<sup>11</sup> 甚至有學者還主張現代國家乃遊牧民族所創造者。

護國家利益；而德國工業雖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具有領先群倫的優勢，但部分來自大戰拖累之故，終於還是輸給有「世界工廠」稱號的美國。總之，由於同時擁有壓倒性的軍事（核子技術與全球性投射力量）與經濟（佔全球工業產值大半並擁有全球最大黃金儲量）等絕對優勢，這也使美國在 1950 年代當仁不讓地成爲「超級強權」。

儘管如此，不僅是美國，其實從歷史上看來也沒有任何霸權國家能恆久存在下去（Organski & Kugler: 1980; Midlarsky, 1988）。<sup>12</sup>由於霸權與其他國家間的權力差距經常會因種種因素而被拉近，從而也帶來體系重組的效果（王逸舟，1999：第十章；Rosecrance, 1987: 288-296，筆者整理見表二所列）。<sup>13</sup>以美國爲例，1950、1970 與 1990 年代可說是其二十世紀後期外交政策的三個重要轉捩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由於具備前述的絕對優勢，這也使其霸權外交顯得相當自信且充滿擴張或侵略性，而諸如像「圍堵政策」或「大規模毀滅」都是此時期的主要行動方針。但在 1970 年代後，一方面因爲與蘇聯進行大規模軍備競賽，並進行全球性結盟競賽的關係，於是消耗掉相當的經濟能量（Modelski, 1987; Gilpin, 1981）；<sup>14</sup>但更重要的是，包括

<sup>12</sup> 此部份的想法被稱爲「權力轉移理論」（power-transition theory）。

<sup>13</sup> 有些人特別關注於其中的「循環」（cycle）現象。

<sup>14</sup> 主要是由於公部門支出過度擴張，導致國家財政負擔過大所致。

西歐、日本與新興經濟體(NIEs)等競爭者的相繼復原或崛起，也讓其相對領先地位隨之縮小；再加上因為介入越戰失敗而導致國內孤立主義聲浪再起，於是美國的霸權角色也跟著出現動搖或甚至陷入崩解的窘境。例如在美國廢除固定匯率政策，導致布萊頓森林體系解體，而「七大工業國」(G-7) 高峰會也接著出現後，國際經濟體系顯然已從單極領導朝集體領導的結構邁進，至於尼克森主義(Nixonism)所強調的「有限介入」與「區域合作」等退縮策略，更凸顯出美國軍事霸權的力有未逮之處。其後，隨著美國的逐步裁減各地駐軍並緊縮安全承諾，其全球影響力當然也大不如前。

表二：霸權轉移與國際政治變化

霸權建立階段	霸權危機階段	霸權解體階段	霸權重構階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建立正當性</li> <li>• 體系範圍擴張</li> <li>• 強制落實體系規範</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全球競爭激化</li> <li>• 不滿現狀者崛起</li> <li>• 相對優勢衰退</li> <li>• 權力要素出現質變或追趕者取得關鍵技術</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霸權國家政策退縮</li> <li>• 同盟競賽增溫</li> <li>• 國際衝突事件頻傳</li> <li>• 關鍵武裝技術擴散或爆發大規模戰爭</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研擬新國際規範</li> <li>• 體系再造</li> <li>• 國際秩序趨穩</li> </ul>

從某個角度看來，中美台三角關係的產生質變，正可說是這種複雜國際環境變化下的產物。儘管美國因相對(而非絕對)力量減少，使其有必要現實地修改其政策，但在繼續維持領先

地位的迷思下，要驟然改弦易轍也不太可能，最後是換個辦法來維持舊有利益；英國在二十世紀初期從「光榮孤立」走向「協商結盟」政策，其目的正在企圖維持其霸權地位，而美國所以在二十世紀末從「單極主導」轉向「多邊合作」，心理傾向也是一致的。這也是聯合對抗蘇聯的所謂「反霸」宣示何以成為中美三個公報的貫穿性主軸的緣故；正因此時打北京牌來制衡莫斯科的重要性，遠大於打台北牌來制衡北京，於是在聯合國席位與建交問題等爭議上，台灣也就成為必然被犧牲的一方，正如早期的大陸政權一般。從這個角度來看，相對於美國霸權在 1950 年代的鞏固與擴張帶來了兩岸的分裂結局，美國霸權在世紀之交所凸顯出來的實質變遷，當然也可能替兩岸的未來發展埋下伏筆。這也是我們所要繼續觀察的。

#### 肆、第三次工業革命與霸權變遷

無論如何，相較於美國霸權在 1970 年代的看來似乎江河日下，其國際地位到了 1990 年代卻有著明顯的回春跡象。原因之一當然是蘇聯集團的崩解；由於最可能的挑戰者出現潰散性發展，美國因此拉大了與其他國家間的相對優勢。換句話說，它至少在軍事層面又重回霸權地位。至於在經濟能量方面，儘管來自西歐與日本的追趕一度使美國出現窘態，但由於日本在 1980 年代發生結構性的泡沫危機，而德國則受到 1990

年完成統一後的財政壓力拖累，至於若干亞洲新興經濟體也尚缺乏實質的挑戰能力，更重要的是，以資訊產業為主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在美國爆發開來，<sup>15</sup>於是其經濟霸權也因此而有了重建的機會。

正因如此，在 1980 年代曾疲態畢露而導致「衰落論」說法甚囂塵上的美國經濟，終於又因為突破技術瓶頸而獲得重生契機。<sup>16</sup>從歷史上看來，恰好也正在我們所謂的「歐洲型霸權」階段中，由於十九世紀初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將蒸汽力量運用到礦業與交通上頭，結果為經濟及社會都帶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在歐洲出現工業化、教育普及化以及都市化等結果，同時主要的歐洲國家也紛紛將由此所帶來的新經濟能量轉化為支持帝國擴張的動力。接著，在二十世紀初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則引進了電力、合成技術以及內燃機等最新發展，由於美國因此從農業國家轉變成全球首屈一指的工業與都市國家，從而也為其未來的霸權地位奠下基礎。正如我們在前段所言，所謂「歐洲型霸權」所凸顯出的乃是種同時具備軍事與經濟要素的「雙重

<sup>15</sup> 關於此次變革的說法不一，例如 Tehranian (1999) 便由帝國主義角度區分所謂農業帝國主義 (550B.C.-1648)、工業帝國主義 (1648-1991) 與資訊帝國主義 (1991 迄今)；而 Toffler (1990) 則區分第一波農業革命 (1 萬年前)、第二波工業革命 (18 世紀末起) 與第三波資訊革命 (1950 年代中期起)；至於 McCraw (1998) 則區分第一次 (1760-1840)、第二次 (1840-1950) 與第三次 (1950 迄今) 等歷次工業革命；但對於二十世紀後半的發展描述仍頗類似。

<sup>16</sup> 例如 Paul Kennedy (1987) 便因主張衰落論而與 Huntington 在 1989 年打筆仗，另見 Thurow (1985)。



霸權」型態，特別是包含技術創新與組織管理能力的經濟面向，更是能否取得並擴張霸權地位的關鍵，因此作為此型態巔峰代表作的美國，既在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取得先驅者的角色，自然甚有助於其霸權地位的延續。

儘管相關發展迄今確實有助於重建美國霸權，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威脅其地位的負面因素也未必不存在。從某個角度來看，所謂資訊革命雖是種有助增加權力的關鍵要素，但其後續發展卻常具有複雜的「雙刃性」：首先，由於通訊技術發達同時有利於資訊普及與教育方式改良，從而使後進國家因為可藉此突破領先國家的知識壟斷，於是出現快速拉近距離的捷徑（例如利用網際網路上豐富甚至免費的大量流通資料等，同時正由於為確保領先或壟斷優勢，以美國為首的國家才會祭出「智慧財產權」來加以因應）；其次，由於現代資訊科技具有單點突破性，亦即無須厚實基礎科學或相關產業部門作為支援力量，這也使部分第三世界國家可以打一場經濟上的「不對稱戰爭」（例如印度或巴西等國雖未擁有進步的工業結構，但在資訊與太空等尖端產業上仍佔一席之地，而許多亞洲經濟體也陸續搶進資訊產業的硬體與軟體市場）；<sup>17</sup>再者，由於資訊革命

<sup>17</sup> 儘管有人認為這可能為若干國家內部帶來貧富發展極端不均的「內部殖民」現象，但即使是先進國家也無法避免，見 Funken & Cooper (1995) 與 Hutton (1996)；更甚者，這種發展不均的趨勢同時也是種嚴峻的全球現象，見 Maddison (1995)。

所帶來的技術變遷也因增加疆界的透明度或可滲透性而改寫了民族國家的國防安全準則，甚至使特別是工業國家易毀性明顯提昇（例如紐約恐怖攻擊事件與透過網路串連進行反全球化抗議等）；<sup>18</sup>更重要的是，由於資訊革命所具備的資本密集性與生產週期大幅縮短，亦即一方面技術開發的成本不斷提昇，但新技術出現的迅速往往使產品在完成資本回收前便面臨被淘汰的命運，結果讓多數工業國家因此而陷入進退兩難的「發展噩夢」當中。

總之，在二十一世紀伊始，美國雖利用因長期冷戰結束所導致的國際環境變化以及憑藉其既有實力而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取得先驅地位，於是在某種面向上似乎重建了霸權角色，但究其實質卻未必如此；一方面基於資訊革命的內蘊性，其經濟發展本來就存在著一定的隱憂，此外它也不見得能始終保持領先地位。換言之，美國的霸權依舊是相當不穩的。據此，我們接著要問的是：美國當前霸權的變遷究竟將對兩岸關係產生何種影響？

## 伍、中美對峙與兩岸關係的挑戰

<sup>18</sup> 其實疆界的透明化並不僅反映在國防安全層面，產業投資全球化以及由於資訊業高獲利特徵所帶動的全球經濟泡沫現象，在創造高「連動性」之餘也同時帶來潛在危機，相關討論可參考 Soros (1998)。

無論作為一個可被引導加入後冷戰國際秩序當中的新興強權 (Patterson, 2000: 52-57)，一個具有恢復傳統「中央王國」野心的惡性霸權，(Marble, 2000: 1-18; Mosher, 2000; Gertz, 2000) 甚或是個看來繁榮但其實行將崩潰的區域性經濟體 (Chang, 2001)，西方對於中國大陸未來令人眼花撩亂的預測內容，在在都反映出後者動見觀瞻的關鍵地位。至於在中國大陸內部儘管也存在若干略顯悲觀或保守的觀察角度，所謂「中國崛起」的概念仍逐漸形成某種程度的意見共識。<sup>19</sup>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學者們所提出的軍事或經濟指標等看來，中國確實有拉近與領先國家權力差距的趨勢，但相較於許多人的繼續囿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的權力政治成見，基於新的國際現實，個人認為倒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重新設定觀察的切入點。

對主要的西方國家來說，它們對中國的感覺經常是相當矛盾的。從長期既得權力利益來說，無論是西歐、美國甚至日本等，當然都不希望中國在未來因變得過於強大以致威脅其國際地位，因此「看衰」中國至少是種可慰藉心靈的想法。但相對地，如果就短期的經濟利益來說，正如前述討論資訊革命負面特徵時所列，由於工業產品的生產週期因新技術出現速度的增

<sup>19</sup> 見閻學通等 (1998, 頁 58)。此種說法當然未必為西方所接受，關鍵在於如何正確評估其經濟成長；見 Pekins (1997: 143-145) 與 Khalizad, et al. (1999)。

快而縮短，長此以往，若無法有效解決的話，為降低成本所導致的緊縮動作（例如關廠或大規模裁員）將在影響社會經濟穩定之餘，從而也直接威脅強權的國際地位。根據資本主義的邏輯，開闢新市場乃解決問題的道路之一，這不但是導致十九世紀全球帝國主義浪潮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近二十年來各跨國企業紛紛搶進大陸市場的關鍵。換言之，所謂「中國崛起」的真正原因其實並不在於中國與歐美國家間究竟拉近了多少的距離，而是由於西方對中國潛在市場「需求」大增所導致的。相較於清代末年，今日的中國政府不僅自衛能力增加，而歐美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從某個角度來看也幾乎等同其生存利益（因為擴張市場失敗將導致反噬其經濟結構的惡果），於是中國地位的重要乃昭然若揭。換句話說，中國對其內部市場的調控與管理能力，勢將成為未來其與西方各種談判過程中的最重要籌碼。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當然還是其中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但美國是否能穩定台海局面，其關鍵絕非在台灣能否做好對美工作，重點還是在美國自身的戰略與經濟考量。正如前述，由於美國自冷戰後期以來，便逐漸由霸權性國家變成一個僅具「領先性」（preeminent）的強權，權力的消褪自然影響其全球戰略安排，尤其中國更由制衡「工具」轉而成為被制衡「對

象」(Schulziger, 2002: 379)。無論對美國未來發展持樂觀或悲觀態度者，無不將大陸視為其頭號威脅來源，這也是中美為何從「戰略夥伴」變成「戰略競爭者」關係的緣故。<sup>20</sup>為繼續保障在東亞的政經影響力，日本與台灣便成為美國在世紀交替之際，用以制衡中國大陸的最重要棋子；一方面不斷擴大解釋「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甚至支持日本修改憲法以便重新建軍並出兵海外，同時也逐步修正原先 Clinton 所提「不支持台灣加入國家間組織」的政策立場，甚至還提高台美軍事交流層級（例如允許國防部長湯曜明訪美等）。由此可明顯看出美國的政策走向。(Cambone, 1997: 66；楊志恆，2000：1-30)無論如何，當多數人習慣從政策面來直接分析中美台三角關係時，其實多半都忽略「權力乃政策基礎」的根本現實；換言之，實際權力對比經常是政策是否能落實的最後根據。由此看來，儘管中國目前的確存在包括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多重結構調整問題，但它倘若能有效控制改革中的不穩定因素並繼續維持上升趨勢，並縮短與美國差異並拉開與台灣距離的話，一方面美國的發言空間將自然因此而更為有限，再者台灣甚至可能因無法負荷軍備競賽而不得不屈服。

<sup>20</sup> 見 Brown, et al.(2000).相對地，美國也成為中國大陸的頭號競爭對手，見 Pomfret, "U.S. now a Threat in China's Eye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5, 2000, p.1.

綜上所述，由於美國似乎在上世紀末藉著敵對集團瓦解而取得了重振霸權的契機，同時也確實因領導第三次工業革命而有效地鞏固其地位，從而使其在本世紀初政府輪替後升高了對中國的敵視度或政策強硬度，但因此次工業革命所內含的潛在反噬性，也讓美國在轉而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之餘，不能不保留若干轉圜空間；這也是中國所擁有的反制機會。例如，由於美國在市場、戰略、國際議題與區域衝突等問題的解決上有愈來愈依賴中國的傾向，這也使它對中國的若干要求（例如技術輸出與台灣問題）出現了讓步跡象。無論如何，將問題（無論是經濟自主或者兩岸關係）的最終解決繫於對手的權力消長上畢竟仍舊是過於消極了些。雖然有人或許會以中國的終於邁向霸權展望未來，在此仍須指出，無論接替美國的下一個霸權國家究竟為誰，行將到來的新霸權勢將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型態。進一步來說，僅擁有軍事與經濟優勢的「歐洲型霸權」早已成為歷史性歸類名詞，繼起的美國則擁有「現代型霸權」特徵；問題是：未來是否將出現更嶄新的霸權形式呢？

## 陸、新霸權型態及其可能發展

相較於部分學者側重觀察霸權的「週期循環」現象，（Modelski, 1978: 214-238；Modelski & Thompson, 1988）或將焦點放在霸權國家所擁有權力差距與國際秩序穩定的互動關

係上 (Gilpin, 1981), 本文則希望從補充角度, 進一步觀察霸權國家在不同時期中所凸顯出來的本質差異性。<sup>21</sup>嚴格來講, 從歷史上的霸權更迭過程中, 我們本來就可以發現到, 任何一個霸權國家都必然會帶來某種程度上的「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例如法國式的君權神授與土地制度, 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工業社會與金融機制, 以及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生產線工業改良與道德性霸權形象等。換言之, 模仿雖能提供發展捷徑, 但唯有創新才是人類進步的真正動力; 由此看來, 下一個階段的霸權模式或許也不會繼續墨守成規。

個人認為, 未來的新霸權型態或將是在擁有軍事與經濟的能量外, 同時具備著「道德」權力的新型「三重霸權」(ternary hegemony)。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所謂道德權力並非指在「歐洲型霸權」階段中, 過於自我中心並充滿階級優越感的「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 或「文化帝國主義」力量, (Gramsci, 1978; Mouffe, 1979: 168-204; Kautsky, 1971)<sup>22</sup>也絕不是指部分學者所強調, 重視政治意識價值觀與生活型態主流性的「柔性國力」(soft power),<sup>23</sup>而是指在接受人類文明本即具有歧異性

<sup>21</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謂週期循環現象或許僅存在於同一模式的霸權時期中, 而即便擁有明顯的權力差距, 但不同模式的霸權可能在維持秩序上也會呈現不同的穩定度。

<sup>22</sup> 階級對立意識乃其關注重點。

<sup>23</sup> 例如 Nye (2002: 11) 書中所強調的: 「所謂柔性國力並不僅等於文化影響力,

的現實下，能代表或協調出共同價值，並提供更穩定環境秩序的整合能力。由於因缺乏實際例證而無法加以有效定義，在此我們姑且將之稱爲是「後現代霸權」。<sup>24</sup>

回到我們在最前頭所提出的霸權定義，亦即所謂霸權並不僅凸顯國家間的現實權力差距而已，更重要的是霸權非但擁有制定並落實規範的權力，也可藉此提供「秩序」這個國際公共財。值得注意的是，規範的制定儘管是個權力問題，但規範的落實卻顯然是個道德問題，亦即唯有執法者的客觀公正才能換取被制約者的心悅誠服，而後者的接受度也直接與秩序的維繫度有關。由於過去「歐洲型霸權」的自利與現實主義傾向，使得所謂規範不過只是強者的護身符而已，因此也埋下未來將受到嚴酷挑戰的不穩定因素；至於接踵於後以美國爲代表的「現代型霸權」，雖然因爲擁有理想主義政治傳統所提供的文化力量，而沖淡了其自利外貌，從而也開啓了對所謂國際道德的討論，但根源於一神論的宗教思想淵源，與既存資本主義體系所強調的個人主義基本點，仍然使其很難具有真正道德權力所需的「包容性」，這也是美國霸權所以在世界各地引發相當爭議

---

我們政府在國內行爲、國際組織與外交政策中所秉持的價值觀，同樣都影響了他人的偏好。」嚴格說來，Nye 所謂「柔性國力」與其說是種權力 (power)，其實只是影響力 (influence) 或吸引力 (attraction)。

<sup>24</sup> 由於它或可帶來國際秩序的恆久穩定，亦可稱爲「終極型霸權」(Ultimate-style)。



的原因。(Huntington, 1996)<sup>25</sup>

當然，霸權的發展方向未必僅僅是本質上的變遷而已；部分學者認為，如果霸權國家能建立起穩固的國際或區域合作建制（regime）的話，即便未來霸權根基相對衰退，其所建立的機制仍將自我維繫，並繼續發揮穩定秩序的功能。(Keohane, 1984)<sup>26</sup>不過，由於在可見未來，國際間的「權力不均」現象與「自利」繼續主導國家行爲的特徵仍未見轉變跡象，因此透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機制來建立秩序的理想恐怕還是難以落實。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否出現實質動搖，目前它都正處於表二所列「霸權危機」與「霸權解體」的過渡階段中；假使它能把握前述原則進行自省與創新，甚至建立起真正的普世性道德規範的話，或許有機會更上層樓。相對地，若它仍囿於軍事優勢與主流意識型態迷思，企圖以制度擴散甚或先制攻擊來維持領導地位的話，(Carter & Perry, 1999)<sup>27</sup>不僅將無法真正維護全球秩序，特別在那些美國扮演關鍵角

<sup>25</sup> 其影響包括各地反制全球化的「本土化」(Localization)趨勢與所謂「文明衝突」結果，甚至包括恐怖主義行動在內。

<sup>26</sup>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國際合作行爲將在霸權衰退後一定程度地維繫國際體系秩序穩定，見 Gilpin (1987)。

<sup>27</sup> 相較於冷戰後期的退縮政策，新干預主義 (New Interventionism) 或預防性防禦 (Preventive Defense) 等積極做法在後冷戰時期已代之而起。

色的潛在衝突區域（例如台灣海峽問題）中，更將因此而埋下不穩定的發展變數，亦即兩岸間的分立平衡將隨著美國霸權地位變動而受到影響，特別對長期依賴美國的台灣而言，可能產生傾向負面的發展。進一步來說，儘管「霸權穩定論」者喜歡將焦點放在霸權國家與國際秩序穩定的連帶關係上，但從霸權「更迭」或「循環」的歷史現實看來，霸權的穩定功能顯然是有限制的，甚至國際秩序穩定或許也僅僅是霸權維持其既得利益的「副作用」而已。由此，對於霸權本質變遷的觀察不僅可使我們瞭解霸權國家的政策，或許也有助於預測國際秩序的不穩定由來。

## 參考文獻

- 王逸舟 (1999)。《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2卷2期（2000年4月），頁1-30。
- 閻學通等（1998）。《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Franz Oppenheimer 著，薩孟武譯（1986）。《國家論》。台北：三民書局。
- Acheson, Dean (1969).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Arrighi, Giovanni & Silver, Beverly, et al.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rown, Michael et al. (2000).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mbone, Stephen A. (1997).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in North-East Asia," *Survival*, 39, p.66.
- Carter, Ashton & Perry, William J. (1999).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 Chang, Gordon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 Chen, Theodore His-en (195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 East," *Current History*, 28.
- Curtin, Philip D.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nken, Claus & Cooper, Penny eds. (1995). *Old and New Poverty: the Challenge for Reform*, London: Rivers Oram Press.
- Gertz, Bill (2000).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New York: Regency Publisher.
- Gilpin, Robert (2003).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msci, Antonio (1978).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26*,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obsbawm, Eric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udson, Michael (2003).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utton, Will (1996).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Vintage Press.
- Kautsky, Karl (1971).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Norton Press.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 York: Random House.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order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1967-1977," in Holsti, O., Siverson, R., and George, A,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halizad, Zalamay M. et al. (1999).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 New York: Rand Corporation.
- Kiernan, Victor (1995).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 other Culture in the Imperial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 pp.242-259.
-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Press.
- Marble, Andrew D. (2000). "Why the 'China Threat' Debate," *Issue & Studies*, 36, pp.1-18.
- May, Ernest R. (1975).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New York: J.B. Lippincott Co.
- McCraw, Thomas K. (1998). *Greating Modern Capitalis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dlarsky, Manus (1988). *The Onset of World War*, Boston: Unwin Hyman.

- Modelski, George & Thompson, William (1988). *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odelski, George (1987). *Exploring Long Cycle*, Boulder: Lynne Rienner.
- (1978). "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pp.214-238.
- Mosher, Steven W. (2000). *Hegemon: China's Plan to Dominate Asia and World*,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 Mouffe, Chantal (1979). "Hegemony and Ideology in Gramsci," in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Nye, Joseph S., Jr.(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ganski, A.F. & Kugler, Jacek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ye, Kenneth A. (1987). "Constrained Confi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agon Foreign Policy," in Oye, A. & Rothchild, D., eds. *The Reagon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 Patterson, Bradley Jr. (2000). *The White House Staff: Inside the West Wing and Beyo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Pekins, Dwight H. (1997). "How China's Transformation Shape Its Future," in Vogel, Ezra F.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Press.
- Pomfret, John (November 15, 2000). "U.S. now a Threat in China's Eyes," *Washington Post*.
- Purifoy, Lewis M. (1976).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New Viewpoint.

- Schulzinger, Robert D. (2002). *U.S. Diplomacy since 19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Rosecrance, Richard (1987). "Long Cycl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pp.288-296.
- Speck, W. A. (1993). *A Cambridge Concise History of Britain, 1707-19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hrani, Majid (1999).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Do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ourse*, New Yor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Thurrow, Lester (1985). *The Zero Sum S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Toffler, Alvin ed. (1990). *Powershift: Knowledge, Wealth, and Violence at the Edge of the 21th Century*, New York: Bantam Books.
- Tomlinson, B.R. (1975). "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80-1935,"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Issue 12.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 1950).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78).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Washington D.C..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9).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ransition of US's Hegemony And Its Influence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Tung-Chieh Tsai\*

## Abstract

Whatever approach we t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ould always exist some kind of hierarchic feature,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so-called "hegemony".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transition of time and environment, the hegemony will also change its definitions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s. In this paper, viewing the hegemony's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we would try to induce it to three types: Classic-style, European-style, Modern-Style; and even predict the future ternary hegemony, that is, the Ultimate-style. Except to realize the results that hegemony would influence our world, we will also tak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n example, to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Hegemony,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Industry Revolution, U.S., Mainland China, Taiwan

---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